

DUKU

读库

1404



DUKU

读库

1404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 1404/张立宪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33-1602-6

I. ①读…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1313号

## 读库1404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0897213

官方网站: [www.duku.cn](http://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mm×925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9月第一版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02-6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         |           |
|---------|---------|-----------|
| 1-69    | 生而有罪    |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
| 70-87   | 心战      | 商华鸽       |
| 88-155  | 阡陌行     | 绿 妖       |
| 156-183 | 杂技四十年   | 吴 越       |
| 184-211 | 勐龙河畔    | 王昌改       |
| 212-230 | 百时屯的七个人 | 姜淑梅       |
| 231-254 | 破裂的沙漏   | 洪 韵       |
| 255-268 | 这么早就立体了 | 亓冠奇       |
| 269-291 | 一份书账    | 杨 葵       |
| 292-317 | 唐代文工团   | 和 乐       |

# 生而有罪<sup>①</sup>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纳粹子女访谈录。

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却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

---

① 本文为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同名图书的摘录。本书1987年出版后曾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至于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又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歷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就像是涉身所熟悉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我开始写作这本书。当时，我想到两种接触纳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种最为可行。我是应当与那些尽人皆知的纳粹分子的后人交往，还是应当四处打探纳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种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个线索导致另一个线索，时隔不久，我已当面或在电话上同二十五名男女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父亲可谓纳粹时期的头面人物。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建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这些拒绝同我谈话的人中，有赫尔曼·戈林的女儿，虽然我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读过对她的采访。并非所有接受采访

的人，都出现在我的书中。我希望同时涉及显要人物和普通追随者。只注意纳粹要人的子女，会使本书别有一种意味，而这正是我力图避免的。毕竟，第三帝国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市长、铁路雇员、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我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子女：他们如何成长，知道些什么，问过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带着这些隐秘生活的。

就下层纳粹分子而言，我依赖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线索。如此一来，我与一些自愿承认其父母是纳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要采访的是纳粹子女，而非行凶作恶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我只关心儿女的想法，他们是否把父母当作纳粹分子看待。我没有同他们任何人的父母谈过话。最重要的标准是儿女如何评价父母。

本书无意裁断以往种种暴行的轻重。有的纳粹分子，要对千百人的死亡负责，有的只不过是一名小镇镇长，捉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对前者的子女，我并不一定就更感兴趣。

我在最初接触一些名声不大的纳粹分子的子女时，曾经犯下一些大错。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挑剔的态度，因此将我拒之门外。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你的父亲是不是著名的党卫队军官”或“你不是一个纳粹要人的儿子吗”等等，却让许多人改变了主意，不愿再接受采访。

我逐渐得知，必须改变提问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经验，我会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作“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我甚至许诺可以通过采访来洗刷他们父辈受到的指控。

这样便混杂了对各色人等的采访，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们的父母，有人仍然崇拜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杀人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寻常百姓。我没有费力去为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分类，更没有按照他们的态度去评判他们。这些事情要留给专家去做。我无意自称书中的汇编符合科学抽样调查，它不过是杂糅了当今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断。在我采访的四十个人中，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行为反应各异。然而，尽管



有种种不同，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是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得知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皇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

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是“一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

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信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儿子是奥地利青年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犹太姑娘。

亲爱的赫维格：

我今天写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将要返回法兰克福。此后的几天，对你不会很轻松。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同样令我牵挂，我不但用我的心，而且用我清醒的头脑来判断你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乃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你会感到安心一些。我要你以一种友好的

方式同她分手，但言辞不妨含混些。告诉她，你会写一封信给她，将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所有问题、约定等等，推迟到日后解决，将所有事情搁置起来。我的这个建议，乃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就事情本身而言，有些问题我们两人应当坦率地谈一谈。

伊娜和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论、批评、建议、比较……你母亲和我都认为，伊娜的很多缺点，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克服。我们还知道，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都不妨拿来讨论一番，听听我们的劝告。但伊娜的出身问题，却平添了一个致命的因素。今天，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全然不似当年。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人的角度：确实，这很令人遗憾。伊娜对此没有责任。而讲到伊娜，这个问题必须巧妙地加以处理，最好暂时提也不提，除非伊娜强迫我们改变看法和态度。出于同情心，我同意礼貌地接待伊娜。星期五，我还很可能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你应当从中感受到我的客观态度。说得更明确一些：你做出你的决定，我也做出我的决定，而我的决定就是，伊娜离开后，我的大门将永远向她关闭。

这封干巴巴的信或许有些粗暴，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另一个原因则与你有关：我知道从长远来说，尽管你有良好的意愿，却仍然难以承受那种势必摧心裂肺的负担。或许在你的世界中，不会每个人都对你持有保留或偏见，但或许你会疑神疑鬼。作为父亲，我绝对有责任提醒你注意事情的后果，明白地告诉你将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家族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讲明这一点，即便它听起来也许刺耳，或者确实就是刺耳。

我给你留出时间，劝你也不要着急做出最后决定。你如果决定了永远结束这一段插曲，就请告诉我。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它们本不一定会发生，我甚至希望这只是我的多虑——即可能的法律后果，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你们在最初相互通信时，要让我知道，以免由于操之过急或考虑不周，留下可能对你不利的文字。既然你来我这里度周末，我们会有机会讨论此事。眼下随和一些，不可粗暴对待伊娜。她的处境也不见佳。但要慎重。甚至不要提到婚嫁二字。草率行事，你

会发现，凭你现在的观念和想法，你完全无力应付周围的势力。

因此，请你体谅我的一番用心，父之于子，大抵会如此的。

爱你的

父亲

1965年4月6日于林茨

又及：对周围的人，只说你的客人已经离开，继续完成她的学业。除此之外，再不必多言。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儿女们感觉到他们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

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面对确凿的证据，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他们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他们，或者评判他们。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

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健忘。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变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病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

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儿女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他们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于锻造新的民族个性，使历史的重演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与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

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看作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被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杀人还是被杀。

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

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着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

## 安娜

我的一生几句话就可以说清：1947年生于慕尼黑。长于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学。护士学校。二十八岁结婚。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银行工作。他照料我们，我照料家庭。日子过得不错。

故事的这一部分也不复杂。或许可以概述如下：十三岁时，我发现父亲并不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营任职。而母亲也不像她讲的那样，待在家里忧心忡忡，等待前线传来丈夫的消息。不，父亲每晚回家，就像从办公室下班归来。然后，他坐在桌前，母亲已为她这位勤奋工作的丈夫准备好晚餐。他尽他的职责，她也尽她的职责。

我还很小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它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绝对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不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对我父亲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发生后，我们家是怎样一幅情景。但也许，以你的历史背景，你是无法想象这一切的。当时，我父亲在警察局供职。战后不久，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样。也许还更快活些，我也说不清。至少，我不记得我有什么特别的不开心。法西斯主义？纳粹？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从没有在我家中被谈到过。

母亲过去告诉我：“战争时期，你父亲在前线作战，和别人没有两样。”我不可以就此向他发问，因为这会让他心情烦躁。而我也从来没问起过他。为什么要问呢？战争？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了。确

实，市内还有不少轰炸后留下的废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只同别人有关系。

然后，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记得它出自政府还是出自律师，我没有印象了。我始终没读过那封信。收到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我察觉到一定出了什么事。几天以来，只要我在场，他们就几乎一言不发。两人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母亲甚至两眼含泪。今天，我还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问任何问题。我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里，认定如果我知道什么，母亲会告诉我的。父亲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吓人的公文箱来家里。当时，只有一件事让我烦心，人们总是在起居室里碰头，而这样一来，我就看不成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亲坐在厨房里吃晚饭，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安娜，你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和你谈谈。”我放下汤匙，望着她，听她讲话，却听不懂她在讲些什么。她似乎总是让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那一晚上还是透着古怪。母亲像是第一次显得犹豫不决。她开始结巴、兴奋、歇斯底里，话说得颠三倒四，不时抽噎，经常插上这样几句话：“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们问，你的父母怎样向你讲述战时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不管谁问你，你什么也不知道。”随后，她试图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关于诬告、举报、一些坏人想要从我们身边将父亲夺走。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既然我不习惯提问题，只有听从母亲的告诫，什么也不说。无论如何，我能说些什么呢？

母亲怕得要死。至少今天我是这样看的。她什么都怕：怕我、怕警察、怕审讯、怕邻居，当然也怕那些幸存者。

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乱。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出现，和父亲坐着谈话。母亲通常待在厨房里，眼泪汪汪的，不时送上咖啡或啤酒。我根本没机会同父亲讲话。他不再去上班，整日待在家里，几乎一言不发。我躲着父亲，避免同他接触，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我慢慢开始疏远父亲和母亲。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直到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我已经十三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我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同父母吵架，虽然当时他们对我仍然很重要，例如拒绝穿母亲为我准备好的衣服，或者闹着同要好的女孩子一道游逛。这些事我的孩子现在做起来，想都不用想。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父母亲比往日更紧张。母亲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终于等到了。她拿起话筒，除了“对，对”之外，什么也没说，而每一个“对”字之后，她的声音也随之更加坚定。然后，她放下话筒，热泪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搂在怀里说：“现在没事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你父亲。一切都好了。”

这次轮到我问了，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笑话我，要是你想的话，也可以不相信我，或者认为我智力迟钝，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提问，我问道：“妈妈，没什么事了？”母亲回答说：“你父亲被宣判无罪；他是无辜的，他从来都是无辜的。”

这些话和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一个推进装置，将我送入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我激动地甚至有些恼怒地问她，父亲被宣判没有什么罪，他做了些什么，谁在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不用说，母亲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翻来覆去，讲了一些我不难明白的字眼儿：无耻啦、告发啦、政府恐怖主义啦，还有——请不要生气——犹太人。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家提到这个字眼儿。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从不存在的字眼儿。

这番谈话结束了我童年的幼稚和愚笨。我开始多疑，第一次感到父母有些事在瞒着我。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



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年纪稍长于其他老师，而且和蔼、友善。无论我们在课堂上做什么，他从不发火。我们一向对他不很在意。一天下午放学后，同学们大都离去了，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安娜，如果你想同什么人谈谈，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事，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仅仅几天后，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请我去他家里。这事本身就不寻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从没有请求过。第二天我去了他家，转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又去了。我仍然同他保持联系。他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我们从没谈起过我父亲。他是那种老爷爷似的人，或许还可以取代父亲。他是那么的单纯、可靠。从他嘴里说出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对待我的医生那样对待他的忠告。

他对我讲了些什么？他又能讲些什么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